

道：秩序与句式

——读道经二十八章

张志扬

内容提要 《道德经》二十八章可看作五千文的拱心石,因为其秩序含盖了人的生命——“知雄守雌”复归于“婴儿”、社会生活——“知荣守辱”复归于“朴”、以及最高的自然境界——“知白守黑”复归于“无极”,由此求得的是圣人之用——“大制不割”。其句式也包括了“取舍式”、“回旋式”、“中和式”,其中尤以“中和式”最具道德经的“道法自然大化于无极”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秩序与句式,两者相得益彰。

关键词 秩序 句式 知白守黑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授 570028

这里,先将要作解读参照的《帛书老子》第二十八章录下:

甲本: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婴儿。

知其日(荣),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忒),恒德不贷(忒),复归于无极。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乙本: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日),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忒),恒德不贷(忒),复归于无极。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一、直观印象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前,据说流行的《老子》主要有四种:晋严遵《老子指归》、隋《河上公本》、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唐傅奕校订《古本老子》。其中以“王本”、“河上公本”为盛。此处仍以“王本”^[1]为主要参读本。

手头关于老子《道德经》的书有四部半(按建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洪修平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关键词 儒佛道 思想家 中国思想文化

洪修平,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10093

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但儒学的创立及其历史展开,儒家思想的特点与精神,以及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无疑都离不开具体的儒家思想家个人的努力。

儒学创立于先秦时代。儒学的思想之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孔子之前的上古社会,“仁”和“礼”等都很难说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本人也曾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孔子个人的创造性贡献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因子在孔子之前是潜在的或不系统的,它们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是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仁”为中心,倡导仁、礼并重,“仁”主要体现了

对人的意义、价值与本质的探讨,“礼”则体现了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孔子正是通过对人的本质与人伦关系的探讨,完成了儒家特有的价值体系的构建。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如何选择文化发展的方向?如何为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文化指导?孔子所创的儒家选择了重建礼乐文化制度、以仁义礼乐教化为主要特点的人文指向,从而形成了与道家“效法自然”的不同文化倾向。这是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资源创造性整合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就,并奠定了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

孔子以后,子思、孟子、荀子等人对孔子儒学又从不同方面作了发展。子思发挥了孔子“道中庸”、“致中和”的思想,对孟子有一定的影响。孟子提出性善论,发展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内在性

本文是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宗教的发展及精神”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BZJ005。

道德重建与普世价值论纲

陈家琪

内容提要 本文从“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说起,强调了文化、历史的差异和多样一直就是对哲学意识中所追求的整体性、普遍性所发起的挑战;再回到黑格尔的“伟大合题”,讨论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及普世伦理的问题,在道德的理论性资源相对匮乏的基础上讨论了重建的可能。

关键词 想像 欲望 承认 文化突破 道德重建 普世价值

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092

我准备把我近期所思考的问题整理一下。这一问题已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每次只讲其中一个问题,现在所列出的就是一个提纲式的讲稿。

(一)我们都知道德国的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曾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书中提出过“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这一概念,用于概括公元前800年到200年间几乎同时出现于印度、中国、伊朗、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的“文化突破”。这一说法直到1972年前后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先后在罗马、威尼斯等地召开了国际大会,讨论的话题涉及到为什么要把“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规定为“超越意识”;为什么要以“轴心时代”为切入点讨论“文明的起源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其中特别包括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关系、制度化发展的过程、知识分子的相应反映等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前几年也曾引起过我们的注意,主要是在《二十一世纪》上曾有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就是“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告诉我们,差不多

同时,在一少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僧侣、先知、祭司,希腊的哲学家、辩士,中国的士,印度的婆罗门,佛教的高僧等等)身上,大家都对现实的世俗秩序具有了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开始不限于文化的既定传统(一个给定的世界),有了类似于《理想国》的乌托邦主义与回归“前轴心时代”的浪漫主义的分野;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野也可以理解为此岸与彼岸的隔离,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知识分子对既定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的质疑,并由此而为不同文化形态的社会奠定了其基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

(二)既然是“文化突破”,那就是说“文化”总是在前的,“突破”或“超越意识”的萌生在后。“文化在前”的意思是说人生来就是文化的人,就生活在某种形态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之所以被理解为“文化”,就在于它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着某种强制性的塑造作用。“文化”是非遗传的,而且也不再是某些简单行为的复合,而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意

从“爱欲”到政治

——论莱维纳斯“爱欲现象学”的多重意涵

孙向晨

内容提要 莱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在《总体与无限》一书中究竟占据怎样一种地位,似乎不甚明朗,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信手之作。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对于理解莱维纳斯思想不可或缺。而且“爱欲现象学”具有多重意涵,不可偏颇。即对“爱欲现象学”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爱欲问题上,而应该沿着他原本的思路逐步展开,从而揭示出“繁殖”、“父性”、“子女”、“兄弟之爱”等一系列环节,展示出“爱欲现象学”中所蕴涵的多重意味,及其与莱维纳斯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爱欲 爱抚 繁殖 跨实体化 父性 兄弟之爱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200438

关于莱维纳斯思想的研究,大多对集中在他关于“他者之脸”的论述上。“他者之脸”将“我”从生存的经济性中警醒出来^[1],从生存走向了伦理,从而打破了自我生存的封闭性和内在性,使哲学迈向“无限”成为可能。这便是我们对于莱维纳斯哲学的一般理解,也是关于“他者之脸”的分析成为莱维纳斯哲学中最著名篇章的原因。一些讨论莱维纳斯哲学的文章著作,也常到这儿就嘎然而止。但是,为什么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在讨论了“他者之脸”以后,莱维纳斯还要继续讨论“超越脸”^[2]?面对“他人之脸”不正是其哲学的核心思想吗?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脸”呢?这部分内容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关于“他者之脸”论述的逻辑后承呢?《总体与无限》中这部分内容多少显得有些“怪异”。这是因为莱维纳斯最终把超越“脸”的向度指派给了“爱欲”(Eros)。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如“繁殖”(fecundi-

ty)、“父性”(paternity)、“子女性”(filiality)、“兄弟之爱”(fraternity)等。这些概念与莱维纳斯其他思想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似乎也深感迷惑,甚至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内容乃是莱维纳斯的信手之作^[3]。

事实上,莱维纳斯本人在书中对此有过相当明确的界定:“我们必须标示出一个平台,既预设了在脸上他人的显现,又超越这种显现,在这种平台中我背负自己超越死亡,从返回自身中得到恢复。这个平台就是爱和繁殖的平台,在其中主体性被置于这些运动的功能之中。”(TI 253)显然,这部分内容对莱维纳斯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一方面他在这里似乎要进一步说明面对“他者之脸”的种种伦理可能性的秘密来源;另一方面“他者之脸”尽管重要但并非莱维纳斯论述的终点,通过“爱欲”与“繁殖”,莱维纳斯指出了超越“死亡”的向度,标识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同

“返乡”与“开端”

——关于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

王 歌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时的“返乡”和“开端”。呈现两个概念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交织，“返乡”的空间性与开端的时间性具有的同构能够帮助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理解“诗”与“思”间的亲密。

关键词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开端 时间性 返乡 空间性

王 歌，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100871

为什么偏偏是荷尔德林？

1934年在终止弗莱堡大学校长职位后，海德格尔越来越多地在文章中援引荷尔德林，这些文章1951年——即战后五年授课禁令结束——后陆续发表。几十年之久，他的荷尔德林阐释不断发生偏移和深化，与转向(Kehre)后的思想细密地编织在一起。海德格尔为何从哲学史文本转向诗？为何偏偏选择荷尔德林？海德格尔说他的思与荷尔德林的诗有着“不可或缺的必然关联”^[1]。如何理解这种“思的必然性”，如何理解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他乃是诗人的诗人”^[2]？

如果我们一味追随海德格尔的阐释语汇，就很可能被“海德格尔化”，陷入词语自身的丛林和矩阵，而未必真正理解他；如果用通常的哲学语言来解释海德格尔，则更容易将敏感而细微的思想钙化——概念化、对象化，陷入海德格尔想通过“思”所回避的。其实除了哲学史的梳理，不存

在“通常”的哲学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家将真理带入艺术品，同样，哲人需要把真理带入语言。思的追问体现在语言本身的追究中，思的条件与语言的条件相联系，而诗是建立语言的过程，“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3]。如若用非诗的现成语言再现现成事务，就会有悖于对“成其自身”(Ereignis)生成过程的强调，这也是海德格尔通过“诗”思考和表达的原因。语言之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那只是语言本质的一个结果而已。语言不是僵死的产品，而是生产过程^[4]。正如“诗”一样，语言在“思”中也不应沦为有用之器，他提出“不消耗词语……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且保持为词语。”^[5]只有词语不被工具化、对象化、存在者化，与语言息息相关的“存在”才会保持为存在。

有学者批判，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没有遵守任何学术范例，考据不严谨，阐释断章取义。应该说，海德格尔自己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声明“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6]，

脸或者圣像：从列维纳斯到马里翁

徐 晟

内容提要 列维纳斯和马里翁都企图重构西方哲学,但是二者采取了不同的道路。马里翁思想在许多地方都体现着列维纳斯的影响,后者对“脸”的确定是马里翁现象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提之一。所不同的是,在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马里翁认为这张“脸”还是成问题的,它还必须被彻底化为一个“圣像”,二者的差异主要不是各自发出什么样的呼唤,而是所引起的效果:接受到脸之呼唤的“我”是受格的,而领会圣像之呼唤的“我”是与格的。

关键词 脸 列维纳斯 马里翁 圣像

徐 晟,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310028

如果说作为欧洲思想“知情的局外人”,列维纳斯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从外向内的突破与重构的话,马里翁则是对这个传统由内而外的重构和突破。具体说来,前者立论的逻辑起点(不是理论发生、发展的事实上的起点)是末世论,从一开始,这就意味着与形而上学传统保持距离的可能性。《整体与无限》的作者自称这是一部为主体性辩护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实际上改变了传统“主体”这个范畴的意义和用法。这个主体既不是能够建构世界的纯粹先验自我,也不是寻求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的个人,他的主体性和自由,都是由于外在的他人才得以确立。末世论的第一个推论就达到了末世学的可能性本身,也即整体性的断裂,一种无上上下下的意义的可能性。

马里翁则有所不同,他的哲学是有“上下文”

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处于西方哲学的核心,然后步步为营地往“外”突破,直至突破了一切“视域”,甚至企图最终消弭内与外的界限。他的学说是直接从胡塞尔的概念体系当中找到一个可能将这个体系完全倒转、推向极致的概念——被给予性(donation, *gegebenheit*,或译为给予、被给予者)^[1]。

被给予性之所以会引起马里翁的重视,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提示^[2],更重要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胡塞尔的思考从被给予性出发,却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未思成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胡塞尔不断地重新定义还原及其操作步骤,却从来没有给被给予性下过一个定义?虽然它是如此经常的被使用:它本身定义了其他所有现象学活动(*actes*):现象(之显现)、内在性和意向性、“事物本身”和还原,所有的概念都起源于它或者以它为归宿,而对它的定义却一直都是缺失的。在马里翁看来,没有定义本身是一种完善更甚于缺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

周兰珍 潘洪林

内容提要 在哲学史上有关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论述,以知识和价值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层面现代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进行了误读,把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理性,并试图用文化的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政治批判。从学理层面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关键词 科技理性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周兰珍,江苏工业学院副教授 213164

潘洪林,河海大学(常州)人文社科系副教授 213164

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科学、技术、生产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向。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对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西方以实证主义为标志的唯科学主义曾一度甚嚣尘上。自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社会繁荣的背后显露出了重重的危机,人的生存和发展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对其现代化的方案进行反思。在这一反思过程中,对理性的批判尤其是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成为了西方学界的一个热潮。

一、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历史透析

在哲学史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受到了哲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许多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曾经以知识与价值的关系或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的形式出现。在柏拉

图的《美诺篇》等著作中,苏格拉底得出了“美德即知识”的结论。他认为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休谟把价值世界和知识世界截然分开,认为从事实判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这就是引起后人高度关注的“休谟法则”。虽然以上两位哲学家所指的知识,并不能等同于科技知识,但所述问题均隶属于真理和价值关系的范畴。

实证主义思想家孔德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同一,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去。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一样,去描述客观事实,寻求客观规律,做出没有个人好恶情感的事实判断,而不要去作价值判断。“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总貌

程恩富 朱 奎

内容提要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经济理论与现实研究,从范畴到体系、从制度到运行,充满学术性,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认识的较为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其研究视野较为宽阔。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特征方面充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关键词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外国经济思想史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 100732

朱 奎,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200433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德国和苏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支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探讨,但是,西欧和北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中心之一。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并不包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直在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对峙中获得不断发展。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始终关注经济理论与现实研究,从范畴到体系、从制度到运行,充满学术性和创新性。由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病看得更深刻和更清楚。同时,他们也身处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包围之中,这样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视野显得更为宽阔。因此,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论是其理论基础、方法论和理论特征,还是其具体的分析工具,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人的问题和科学问题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两大主题,两大主题分别形成了人本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思想在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并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不足之处,需要“补充”和“发展”。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匈牙利的G.卢卡奇开创,即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其基本特点是:主张追寻马克思的黑格尔根源,强调马克

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

矫 波

内容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模式经历了单一经济增长模式、全面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更替过程。经济增长与制度正义是互生互发的关系,自生自发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完善民主与法治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制度正义 民主 法治

矫 波,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510310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探讨和关注的永恒主题。长期以来,各国都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而经济的滑坡也常常与政治动荡和民怨沸腾相伴。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强势话语,成为现代社会中国家地位和个人声望的重要标志。在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互动过程中,制度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进程和价值,政治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增长释义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的 GDP 或国民产出的增加。也可以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向外移动时,就是实现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产出最全面的指标,GDP(或者

GNP)即指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尽管商业周期中存在 GDP 的短期波动。但从长期看,发达国家的经济一般都显现出实际 GDP 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的趋势,这种进程被称作经济增长^[1]。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指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是经济活动、增进知识和增加资本。

(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1、单一经济增长模式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语义上的根本区别,“增长第一”是发展的信条和尺度。这种观点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隐含着两个严重缺陷:(1)忽略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资源和环境是无价值或者低价值的,可以无偿占用。这种理论误导造成了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环境

“生存伦理”与“理性意识”的共生与紧张

——20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的经济伦理解读

王璐璐

内容提要 20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中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和“一田二主”的特殊现象。本文借助以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伦理”和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理性意识”两种理论资源,探讨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特定地域经济发展背景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农民特殊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

关键词 生存伦理 理性意识 苏南乡村 地权

王璐璐,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212013

在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中,地权关系始终是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曾指出:“地权是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全息元,即地权蕴涵了乡村社会历史的全部信息含量”^[1]。20世纪20-40年代,苏南^[2]乡村地权关系中呈现出的土地所有权分散和“一田二主”的特殊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体现了在这一地区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农民所产生的特殊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的基本态势与伦理蕴涵

从历史上看,苏南地区相对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长期的社会稳定,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明清时期,这

一区域已是“人烟辐辏,市廛兴旺”,成为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然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却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清代以后,土地资源基本已开垦完毕,人口增长、市镇发展对土地的占有更导致耕地面积的缩减。19世纪以后,苏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更为迅速,人地矛盾也更加突出。可以说,苏南传统乡村耕织结合、耕渔结合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性农业的发展,正是对这种人地矛盾的调适和缓解。与此同时,这种突出的人地矛盾,使苏南乡村在土地占有关系和租佃关系上形成一系列的调适性特征。

与农业生产商品化相伴随的土地商品化,使苏南乡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更为迅速。太平天国运动后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近80年间,苏南农村的土地租佃率增长了3倍多。19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ZX022)阶段性成果

债权人 与 债权治理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探讨

吴 婧 李 萍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通过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 and 作用、债权人与企业的相关关系、以及债权人最为关心的偿债能力评价,提出符合国情的债权约束和保障机制,达到银企共同治理的目的。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 债权治理 偿债能力评价

吴 婧,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25002

李 萍,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 210097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对公司治理的意义

自 1963 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定义利益相关者以来,至今已有近 30 种定义。根据杨瑞龙、周业安的归纳^[1]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范围较大,凡是能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或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者、消费者、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团体等;第二、范围稍窄,利益相关者专指那些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第三、范围最窄,只有在企业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布莱尔的典型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2]。这一定义与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概念相联系,即认为凡是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才是企业利益相关者。

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治理结构是“资本雇佣劳动”型的单边治理结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全部归股东。然而随着人力资本专用性的被重视,企业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关注,“股东至上”日益受到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已越来越被推崇。因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不仅在伦理上是完美的,在经济上也优越于股东治理,共同治理促进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所以更有效率。

张兆国认为^[3],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一般应符合如下四个标准:(1) 必须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如资本、劳动等;(2) 必须分享企业收益,即从企业获得股利、利息、工资、奖金等各种报酬;(3) 必须承担企业风险,即当企业经营失败时会蒙受一定损失;(4) 必须分享企业控制权。从以上四个标准判断,笔者认为债权人应属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理由如下:

流通战略联盟的构建及其难点分析

蔡柏良

内容提要 流通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现状及国内外流通业发展趋势,构建流通战略联盟是加快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现实选择之一。而这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尤其是要建立避免国内贸易壁垒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 流通业 战略联盟 贸易壁垒 制度安排

蔡柏良,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 224002

一、引言

尽管从价格形成机制、流通格局多元化程度、市场成熟度、组织发育等角度来看,我国流通业的改革与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1)企业规模小,经营策略不成熟,难以与国外流通企业竞争;(2)结构性矛盾突出,供过于求与农村市场未有效开发并存;(3)竞争环境有待改善,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仍大量存在;(4)技术含量低、现代化水平不高等^[1]。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了流通业自身的发展,更由于流通作为劳动分工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而还严重制约着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加快流通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从流通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 20 年将是流通业现代化、集团化、国际化迅速发展的时期^[2]。

这就要求我国流通业以“大流通、大市场、大集团”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及与之相应的市场法规、管理体系,培育一批规模庞大、市场覆盖面广、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水平的全国性流通集团,并以之为主导我国的流通业发展,规范流通市场,提升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一过程中,组建流通战略联盟是迅速培育大型流通企业、提升我国流通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间为实现关联方的特定战略目标,并共享由此带来的利益,通过共享资源改进其竞争地位和绩效的合作安排^[3]。而这些利益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有效地成本和风险管理、低成本地进入市场和从合伙人处学习,以及帮助公司减少交易费用、应变不确定的环境、减少组织对不受其控制资源的依赖性、成功地重新定位等^[4]。流通战略联盟一般涉及两个或多个独立企业或区域市场,且

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经济价值

唐万宏

内容提要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超前,即要超越当前“满足”经济需求的状态,从“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但这却要以“适度”为内在标尺,即要在我国国情与教育发展规律的范围之内。这样,适度超前发展才能带来一系列或短期或长期的经济价值,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适度 超前 经济价值

唐万宏,南京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210046

截止 2006 年,我国(大陆地区)高校扩招已经走过了 8 个年头,从 1998 年到 2006 年,高校在校人数已由 643 万上升到 2300 万,毛入学率从 9.1% 提高到 21%,这一总数及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宣告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鉴于高等教育无论在教育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举足轻重的价值与地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发展的讨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这种讨论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入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其中,作为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主张——力争在 2010 年或稍后,使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即 27% 的水平^[1]——让人们开始关注是大力发展还是适度发

展问题而不再是去讨论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了。高等教育究竟该以怎样的速度发展以及这样发展有着怎样的经济价值,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性认识。

超前: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起着决定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教育的目标、权力、办学条件、发展规模和速度、体系结构等。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也不断地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需要,从而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2]。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1961 年在《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对美国 1929 年至 1957 年教育投资增量的收益作了测算,发现 1957 年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

主持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SJB880022)“高等学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财务管理创新研究”

从乌托邦到好社会

——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念的演变

成伯清

内容提要 社会建设对于正在全面崛起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为基础,并首先追溯了西方“社会的发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现代性方案展开以来对于社会的理性化和浪漫化想象,接着分析了“极权政治”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两种乌托邦对于西方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破坏性作用,最后概述了当代西方学者有关“好社会”的主张。摒弃“总体社会”的意象、立足于经验现实的结构限制来建构和谐美好社会,可以说是目前西方学界正在达成的共识。我们认为在各种“好社会”的纲领中,如何提升和扩充社会资本成为关键,而振兴和重建形式多样的“共同体”则是普遍认可的途径。

关键词 乌托邦 好社会 共同体 社会资本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10093

“社会建设”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西方学术话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说法。其实,即便在中文语境目前流行的用法中,“社会建设”也有多重含义。一是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乃至文化建设来说的,偏重于整体社会的特定层面和维度,特别是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整合(在这种含义上,相当于“社会整合”,即 social integration);二是指追求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尤其各子系统和制度之间的协调运作(相当于“系统整合”,即 system integration)^[1];三是其他更为具体的含义,比如社会保障(即 social security 和 social insurance)体系的建设,至少就

我们眼前的现实需要来看是如此;最后,我们的“社会建设”也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这就有点类似于西方 state-building 或 nation-building 的意思了。

虽然没有特别对应的概念,但这并不说明西方就没有社会建设之类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学术思考。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自身体系的“转型”之中,同时又面对着全球化趋势——这意味着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制于全球体系的结构力量——我们不仅需要将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在数十年内来完成,而且需要处理前所未有的环境复杂性(比如必须面对全球资源分配上的竞

本项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资助

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郑 莉

内容提要 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如果说现代性的社会建设是以一种关于未来的完美设计赋予现存的社会秩序以合法性的建设,那么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则是在现代性所承诺的秩序、确定性和安全感无法完成意义上的建设。本文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中的后现代性视角出发,通过对后现代性多维图景的分析指出,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完美图景,它不可能通过社会工程学来实现,它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建设,它需要公民承担起无需“理性”支撑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它同样需要一个社会永远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视、批判和改良。

关键词 后现代 社会建设理论 现代化 现代性

郑 莉,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50001

国外社会学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但社会学在其 16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换言之,社会学内在地具有社会建设的精神指向。“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1]。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社会学是研究“现代性规划”的一套知识体系。社会学参与并促成对秩序的追寻,同时它也批判地反思这种追寻的后果、问题和困难。正是由于社会学内在地具有服务与批判的双重品格,促成了社会建设具有规划^[2]与反思

的双重内涵。只不过,在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内涵、性质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古典和现代的社会建设理论是以一种关于未来的完美设计赋予现存的社会秩序以合法性^[3]的建设,它更多地具有社会工程学^[4]的意味,那么,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则是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风险的日益加剧以及现代性所承诺的秩序、确定性和安全感无法完成意义上的建设,它更多地具有社会反思与批判的意味。笔者认为,反思与批判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理论和现实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所以它或许是一种真正

本文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5&ZD03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还受到黑龙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Heurs07021)的资助,特此致谢。

私力救济考

范 愉

内容提要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自力救济的概念既有区别,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整合。在现代社会,尽管私力救济曾受到国家的压制和社会的否认,但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调整机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合法、违法及介于二者之间等不同状态,并由此拥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功能。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私力救济亦十分活跃,国家应充分重视其实际作用,将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并加以适度的法律制约。

关键词 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 纠纷解决

范 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100872

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功能,并在现代社会调整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作为基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则存在着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峻别,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民间性、社会性、替代性机制,这些机制之间又存在高度融合和相互交错。其中私力救济尽管曾受到国家的压制和社会的否认,但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调整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一、私力救济与自力救济的概念

私力救济或自力救济并非一个内涵与外延均十分清晰的概念,而二者是否同一,亦存在争议。对此做过系统研究的徐昕教授,界定为:“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

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他据以界定私力救济的要素是:(1)首要特征: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2)过程:非程序性;(3)原因: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4)主体:认定权利遭受侵害而实施私力救济行动之人;(5)目的:实现权利和解决纠纷;(6)途径:依靠私力;(7)手段:包括针对人身的和针对财产的行为,包括搜查、拘禁、侵入住宅、恐吓、胁迫、留置、窃取、骗取、劫取、抢夺和毁损等^[2]。

从抽象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比较严谨,似乎无懈可击。然而,从事实和实践的角度上审视,却仍存在着一些无法解释或难以周延之处,尤其是关于“第三方”的作用。例如,我国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赔命金”习俗,属于典型的私力救济,但实际上实施过程通常有中立第三方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项目合同号:05JZDH004)的阶段性成果

法律执行的社会学模式

——对法律援助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王晓蓓 郭星华

内容提要 本文在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法执行的社会学模式这一法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法律援助条例》执行状况的实证研究,指出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会赋予执法者特定的角色丛。在这些角色丛中各个角色的不同期待与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形成了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嵌入性关系,对执法者的执法行为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也构成了法的社会学执法模式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法律援助 法社会学 法律执行的社会学模式 角色丛

王晓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100872

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100872

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实际适用过程,即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施行,使法律从书本上的法(law in books)变为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所包含的意志和利益,经过法的有效运行转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法律的实体和程序只是使法律具有了适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重要的,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律的实际适用^①。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律援助条例》具体实施过程的实地调查,来分析当代中国法律的实际适用过程。

我们的调查是从《法律援助条例》最基层的执行机构——某直辖市一区级法律援助中心开始的。法律援助中心是执行《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机构。该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为公

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接受公民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依据《法律援助条例》所确定的援助范围和标准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确定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下,委派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的社会律师或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免费为该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国家给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以一定的补贴。

针对上述这几个方面,《法律援助条例》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是受案范围,《条例》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六项公民可提起法律援助的事项:(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法律援助的实证研究”(0413SH009),项目主持人:郭星华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 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李栗燕

内容提要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同一性和普适性。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后现代法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其批判对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以及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后现代法学 批判价值 法制建设

李栗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16

20世纪中叶以来,席卷全球的“后现代”思想风暴引起了西方法学界的响应,之后形成了后现代法学思潮。这股法学思潮运用独特的解构和重建策略挑战西方现代法律思想,在批判中探索着他们理想的“后现代”法制图景。在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趋势面前,拒绝后现代法学理论已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可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对现代性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以一种新的视角省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尽可能避免现代性中的负效应,并借鉴其提供的新视野反省我国法制的进程、现状与未来。

一、从无情解构到艰辛建构: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

虽然后现代法学的观点和主张是多元的,但在后现代法学这一大家庭中,至少存在着家族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体现了它对现代法学批判的价值所在。

(一)理性主体走向黄昏 “理性主体”是西方自17世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的核心概念,它被视为一个合法性基础和不可置疑的理论基石。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扬主体性,主张个人是自治的、有意识的理性主体,他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现代法学也认为理性主体是一个强调其在法律的制定、适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主体的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

然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理性主体观”进行了无情的解构。福柯呼吁以理性为根基的构造主体乃是人本主义骗人的把戏,他断言:人是现代

本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4BZ2003)的阶段性成果

以水为师:中国水文化的哲学启蒙

潘 杰

内容提要 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文化。中国水文化的哲学是有自身特点的:以观水的直观性,启迪哲学文化的人生观、世界观,阐述人格的魅力;以察水的联系性,升华哲学文化的特质观、辩证观、思维观;以治水的实践性启发哲学文化的规律性、发展性、能动性。在水与人的互相依存中、推动旧文明向新文明的飞跃;在水与人的彼此互动中,彰显哲学文化的传统与创新的魅力;在水与人的和谐发展中,传承创新水文化的新内涵。

关键词 水 文化 水文化 哲学 启蒙

潘 杰,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研究员 210029

一个民族的哲学是其文化系统的主导和核心,代表了该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还是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都表明,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在哲学的高度上过滤和升华,才能奠定它的理论基石。中国的文化是从水文化开始的。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文化^①。而中国水文化最初的启蒙,又是以“哲学之水”开始的,这正是中国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一、以水为师——感悟人生哲理

以水的流动,水的常势,水的无形,水的柔弱,水的浩瀚,水的执着而感悟的人生哲理,启迪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确立对待人生的态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

关系。在受到水的滋养和对水的观察思考中,遥寄人文旨趣,留下先哲的思想经典。

1、以水感悟人生,形成了儒家“中庸”哲学,是“哲学之水”的一大贡献。

何谓“中庸”?推其本源,中庸当出自水体中心线。水体中心线,是早期人类对水的认识,并以此为符,即上为过,下为不及。要顺其自然,适应规律就应“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从水流中思辩出的哲学精神。之后“中庸”又成为了儒家哲学之柱,即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以“中庸”为处世要学。以积极的“入世”的态度,把有限的生命之水,融于无限的人生事业之河。孔子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君子应乎中庸”。这其中就是教人在思考判断时要“执中”,待人处事要“忠恕”,价值取

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 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

丁 帆

内容提要 沈从文的浪漫乡土小说作为和以鲁迅为旗帜的写实乡土小说相对的流派,其文本所呈现出的超越文化和超越悲剧的审美意念,既有反文化、反文明的一面,也有从逆向审美应和新文化思潮的另一面;既有日神精神的表象,也有酒神精神的内蕴。他的小说中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写,以及对现代派意识流的化用,都为其“乡土抒情诗”的美学追求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文化 悲剧 诗意抒情

丁 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3

沈从文这位“中国的大仲马”,由于历史的偏见和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所限,曾经长期受到贬抑而被有意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史家的眼里,他的文学声名才日渐上升,成为人们竞相研究的对象。沈从文自诩其文学风格与废名相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说:“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1]沈从文的自诩是恰切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苗、汉、土家各族血液的风俗画小说大家,应该说是独树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另一帜。如果说鲁迅是“写实派”乡土小说的旗手和导师,那么,沈从文就是“写意派”风俗画乡土小说的扛鼎人物。

沈从文生活经历的丰富,或许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他的早期经验与社会知识,最初是在乡野与从军的经历中积淀下来的。在湘西土著军队任司书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厮混,亲见的残酷杀戮成千上万,这成为他逆向思考人性与人类文明的最深隐的“心结”。沈从文是在那个与汉儒文化思维格格不入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其童稚、率真、质朴使他对自己闯入的另一种文化有些隔膜,甚至仇恨。沈从文最初没有发现自己文化积存的优长,他进入北平以后曾模仿别人写文章糊口,他那时还不明白一俟用自己的笔来展示与自己生命最切近的独特文化时,其文学的美学价值便会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这其实就是声明自己是站在“五四”文化精神的逆反方向来构筑自己的乡土社会,以此来与城市文明相抗衡。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

——以 1931 年创作为例

秦林芳

内容提要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关键词 丁玲 思想基因 革命意识 个性思想 1931年创作

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211171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向来具有其思想性质。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总要表露出或流露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思想风貌,而创作的基本思想风貌也真实地呈现了作家的思想状态。因此,要比较深入、比较准确地把握作家的内在思想及其矛盾,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从其创作入手。

本文对丁玲思想意识及其矛盾的把握,所取的正是这一角度和路径。而在其创作的长河中仅仅截取1931年这一个断面,原因在于:1931年是丁玲完成其思想和创作转型的一年。在1929年底创作《韦护》之前,丁玲的思想和创作还处在比较单一的“莎菲”时期。1929年底至1930年,丁玲

的思想和创作开始发生变化,并于1930年5月加入了“左联”,但是,她仍然抱着“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1]的想法,并没有参加“左联”的任何活动。而到1931年,丁玲因胡也频牺牲的强烈刺激,而将希望寄之于“大家”、“集体”,并在行动上积极投身于革命和集体的行列,从而急速完成了思想的“左转”。丁玲思想上的这一巨大变化,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迅疾的反映——革命意识的思想基因到此时已融入其血脉中。但与此同时,其转型发生之前所固有的“五四”个性思想,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基因,在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1931年,仍然顽强地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或以二元并置的方式或

从“写平民”到“平民写”

——试论 20 世纪末“平民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刘志权

内容提要 关于“平民文学”，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写平民”的平民文学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平民写”的平民文学两种不同看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时代的合力使鲁迅所说的余裕环境下的“真正解放的平民所写的”平民文学成为可能。新的平民文学有别于对平民表示同情或进行批判的传统平民文学，而把生命意识、自由欢乐、平等相对、世界性及群体性、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务实等“平民精神”带进了文学。本文初步概括了平民精神在平民文学中的五个层面的不同呈现形态，体现了平民精神在城乡过渡这一宏观社会现实下的承续和变异。

关键词 平民文学 平民精神 平民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210097

20 世纪末，“平民意识”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相关的讨论是围绕着王朔的小说创作、韩东于坚等人的诗、朱文等人的新生代小说创作，以及在九十年代前后期涉及颇广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断裂行动”等进行的。而略有混淆、纠缠不清的类似概念则是“民间性”。这一概念既见诸平民化的作家（如韩东《论民间》），也见诸高举理想大旗的作家（如张炜《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同时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以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为标志），可以说左中右皆备，落脚点各有不同。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平民文学再次以“草根文学”的形式甚嚣“网”上。因此，认真考察平民性的特点，厘清平民文学

概念的内涵外延，对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征，以及解释文学创作的当下及未来走势不无裨益。

“平民文学”概念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出自周作人在 1918 年 4 月的讲演《日本小说近三十年之发达》，但产生巨大影响则是由于同年底的论文《平民文学》。在这篇广为人知的论文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界定着重于其“文学的精神”，内涵是“普遍与真挚”。这两点其实是在与其对立面“贵族文学”的比照中产生的：“普遍”体现为不“偏于部分”，也即“浑在人类中间”、“世间普

论 1990 年代后新海派女性散文

周红莉

内容提要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海派文学的生成是与某种自由而商业化的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相链接的。在新的文化时空中,新海派女性散文作家以自己的书写形式和精神姿势,行走于时尚与世俗、当下与过往之间,言说着关于城市、关于女性、关于自我生命的种种存在。尽管新海派女性散文尚不具有深度写作模式的分量,但其作为“城市的心灵”,自有文学和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 新海派 女性散文 城市 记忆

周红莉,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 215500

论及海派、海派文学、海派女性散文,从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无论是理性的断语^①,还是稚拙的描摹抑或喧哗的演绎,言者都确认了它们在精神状态和文化姿态上与“商”难以剥离的关联性存在。海派已被惯性地甚至合理化地定性为商业社会的精神产品,是一种地域文化与人文生态共谋的文化现象。

越过时间的屏障,当我们重新审视海派及其敷衍出的文学、文体时,我更为关注的是当代(特指 1990 年代后)新海派女性散文的规模化生成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意义。当代新海派女性散文书写的登台与走向,同曾经风靡海上的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施济美、汪文玲及东吴大学的“东吴女作家群”等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撰稿人有着某种师承关系。她们都是用极具“做女人的自觉性”,以习焉不察的平凡乃至琐屑的女性特有的生活方式为想象性疆域,在“饮食男,女子之大欲存焉”的俚俗话题中,共构多元复调的女性声音。

这种声音的设置,使女性/都市/世俗等相兼容,摹画了一个凡人时代的女性图像。但需要注意的是,张爱玲们、苏青们的多元表述更多地倾向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结构的沉沦方式——“有情绪的”情绪,她们大多或明或暗地以苍凉为生命底色,以日常形式为文本构图,以零介入或半介入为叙说视角,有意识地叙说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混沌,世故黠慧,曲尽人情;而新海派女性散文则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既成语言”,即用真正适合于自己生命的语言样式呈现自己内在的情思与生活形态,用经验化的、个人化的常用语、习惯语、风格语言说着自我的生存方式、经验方式与表达方式。新海派女性散文轻言曼语的书写风致,使我们的阅读不必返回到历史或者生命的幽深之处,嗅着岁月的苍茫言说人事的沧桑。她们的存在,大多以都市生活的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基本特质为构型,穿梭在时尚与世俗的城市影像间,用情绪、行旅及艺术演绎生命的行板,并以亲历性

李伯元与赛金花

王学钧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李伯元与赛金花关系的新史料,还原李伯元的办报风格,以澄清鲁迅对他的误解和当今小说对赛金花的臆想。1897年《游戏报》举办的丁酉夏季花榜虽属在妓女中选美,却贯注着李伯元的民主观念和胸襟;他为赛金花鸣不平所表现出的风格,并非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以赏玩不幸者的痛苦为有趣,而是富于社会正义感和公共良心。

关键词 李伯元 花榜 赛金花 鲁迅 海式的有趣

王学钧,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210013

一、引言

1896年,李伯元(1867—1906)从家乡常州移家上海,受聘于外商,创办并主编《指南报》。当年6月6日《指南报》创刊。一年后,他模仿西方“辞章报”,也就是文艺报,于1897年6月25日自力创刊《游戏报》。这时赛金花(1864—1936)已再度下海,在上海经营书寓——高等妓院,做起了老鸨兼妓女。晚清江南的高等妓女仍然延续着古代娼优一体——“女乐”的传统,提供有妓女酬应的娱乐,诸如歌舞弹唱、设宴侑酒、打茶围之类,“送客留髻”倒在其次^[1]。清朝除延续着古代将“娼优隶卒”定为“贱民”的制度外,又严禁女子登台唱戏,所以在社会中高等妓女更多地承担着女演员的角色。文人社会对她们也延续着古代的评价标

准——色艺为先,而与仅供《红楼梦》所谓“皮肤滥淫”的低级妓女不同。这个标准对理解中国妓女、演员史的变迁至关重要。由于这个传统,高等妓院因而经常是文人聚会和休闲娱乐的场所。赛金花同时也是近百年被不断塑造最为持久的文艺形象。从1898年吴趼人《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到今年初李冬君《孽海自由花: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其间有关赛金花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构成持续不衰的百年赛金花形象史。这也是有关晚清妓女唯一的文艺史典型个案,而愈出愈奇。李冬君《孽海自由花》竟认为赛金花下海为妓犹如娜拉追求“自由”而“出走”。就目前所知,《游戏报》对赛金花的记述,是有关赛金花历史的最早记载。它虽已被历史尘封,但由此既可映照出近百年文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ZW038项目阶段性成果

试论陈师道述贫诗的精神旨趣

陈 斌

内容提要 陈师道述贫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用笔冷静平实,常在诗中进行不畏贫苦的自我鞭策,具有安贫乐道的意趣,反映了作者将“道”灌注诗中,以内在超越对抗贫困现实的旨趣,具有突出的人格力量。

关键词 陈师道 述贫诗 “道” 文学观 诗学观

陈 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100872

陈师道(1052-1011),字后山,北宋著名诗人。他文行高洁,却潦倒一生,《宋史》本传称其“家素贫,或经日不炊”。陈师道诗作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吟咏贫苦,其“述贫诗”熔铸了诗人不為外物所囿而张扬自我意志的主体精神,体现出刻意以完善道德人格来对抗贫困现实的旨趣,这与北宋崇尚刚健凛然士风的时代氛围及陈师道以人性修身为基础的文学观、诗学观密不可分。

一、陈师道的贫困生活

陈师道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陈洎,官至三司盐铁副使,赠工部侍郎;父亲陈琪,官至国子博士通判絳州。到陈师道时,家境已衰落,《先夫人行状》云:“先君以家赀让群弟蓄孤振穷,欲死恤终。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贫,不能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养,人以为忧,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贫。”^[1]

作为一介传统儒士,陈师道获取谋生资本的

主要途径是仕宦,白云:“仆家以仕为业,舍仕则技穷。”^[2]因此,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被苏轼、孙觉等人推荐为徐州教授时,陈师道欣喜异常,《谢徐州教授启》称:“惟兹五斗之禄,足为十口之生,追还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携幼,稍比於人;饱食暖衣,少缓其死。捧檄以喜。”^[3]《代谢再授徐州教授启》又说:“公赐保全,怜其母子之穷,还以斗升之禄。原恩有自,揽涕无从,愿为执鞭。”^[4]后山得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俸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宋代主要以科举取士。陈师道弱冠之年,正逢王安石经学盛行,他因不喜王氏新学而绝意科举,致使其仕途蹭蹬,一生只在徐州、颍州等地做过几年地方学官。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官员的俸禄优厚不少,但两极分化严重,下层官吏俸禄十分微薄^[5]。陈师道不过是一介小学官,又无积蓄,如果失官,就切断了经济来源。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因非科举出身,陈师道被罢官。

文明的重新阐释： 双向互动、多元视角和问题意识

张 杰

内容提要 文明的阐释历来是众说纷纭的,学界甚至很难把文明与文化相区分。其实,文明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很难从单一的角度来阐释。本文将分别从文明发展的正向和逆向的双向互动,文明阐释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等不同视角以及文明阐释的问题意识等方面,努力探索对文明的多元理解。

关键词 文明 双向互动 多元视角 问题意识

张 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10097

“文明”的概念自从产生以来,学界的阐释就是纷繁复杂的,对之很难达成共识。汝信先生在《世界文明大系》中曾经明确写道:“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1]因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明研究中心主持的“世界文明研究”项目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而“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2]。然而,文明的阐释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在于我们能否给予文明以文字上的定义和表述,而且更主要的在于不同的阐释所带来的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将直接影响我们对文明本身的探讨。

在对文明的具体研究过程中,人们较为普遍运用的方法,是从文明的产生、渊源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试图在复杂的文明现象中理出一条由因果关系串联起来的历时性发展线索,并加以科学的归纳、概括和定义。可以说,人类的任

何一种文明,往往都具有一个贯穿于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相对确定的主旋律。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握这种历史主旋律。比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儒家文明的主旋律就是“儒术”,即“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时的‘儒术’”,“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子集成’”^[3]。显然,这种从历史视角出发的研究方法为人类的文明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已经成为文明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文明的认识又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是很难从单一的角度来阐释的。因此,不同的多元阐释,较历史的一元阐释来说,无论如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的途径,从而充实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文将分别从文明发展的正向和逆向的双向互动,文明阐释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等不同视角以及文明阐释的问题意识等方面,努力探索对文明的多元理解。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文明的阐释也是会不断变化的。或许,

促进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制度安排

钱振明

内容提要 政府决策机制优化是良好治理的基础。实现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需要建设具体而合理的制度。为实现决策机制优化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能够有效规范决策系统具体运转流程和运行方式的规则体系。它使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论证、领导集体决策、决策责任追究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起到防止决策随意性、盲目性,避免决策失误的功效。

关键词 政府决策 决策机制 决策制度

钱振明,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 215006

政府决策机制是决策系统的内在工作方式,是作为一个动态运行过程的决策的结构、流程和方式及其制度化组合。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对政府决策系统的各结构、过程、方式的最优组合,达到政府决策的最大效益,减少决策费用,降低决策成本,为政府管理问题寻找解决的最佳路径。虽然决策机制不同于决策制度,但合理的制度即约束决策的规则体系,是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制度保证。我国政府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的具体的制度建设任务,主要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等^①,意在构建一个“群众参与、专家咨

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②,“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③,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制度基础

公众参与,即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介入和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是政府决策的本质要求。政府决策区别于企业决策、个人决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公共性,它是政府代表民众意愿,根据民众需求,制订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公共政策的过程。因而,良好的政府决策机制应该为社会公众参与其中提供信息条件和程序保障,从而使民众的意愿、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决策机制优化”(项目批准号:03CZZ004)成果之一。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季建业

内容提要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关键词 土地 制度 农民 平等权 保障

季建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博士后 100872

土地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主要财产形式,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和基本社会保障。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土地上“闹”起来的,新中国的建设是从土改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推进也是从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头的。回顾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历程,农地制度与农民权益、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权益保障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平等权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必须亟待正视的公共政策问题。

一、农地制度的不完善及对农民平等权益的影响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到2003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框架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赋予农民对土地更多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这促进了农民利益调整、农民增收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土地制度不完善、不配套,土地财产权的不明晰,仍难以从制度上协调和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变革中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

一是农地制度中农民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有地无权。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所有权主体是谁?谁来代表集体,委托人是谁?集体土地的控制决策权由谁来行使?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或虽有规定但却存在法理上的矛盾。首先,集体所有产权主体界定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JSBJ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公用事业：概念与范围的厘定

孙学玉 周义程

内容提要 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公用事业意指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为公众或不特定人群使用,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产品或服务的活动和行业;从类型学维度考察,公用事业在范围上包括供水、节水、排水、电力、供热、供气、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电信、邮政、城市绿化、环境卫生、道路与桥梁以及诸如运河、港口、机场、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等其他公用事业。概念的混淆,范围的交叉,无论对学科建设,还是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做出科学的界定和阐释。

关键词 公用事业 概念 范围 界定

孙学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岗教授 210004

周义程,江苏省行政学院讲师 210004

越是广为流传和使用的术语,越容易因其使用的广泛性与思维定势出现理解上的分歧和混乱。具体来说,“公用事业”这一术语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存在偏差甚至讹误,而且在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话语中亦时常存有歧见或偏颇。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关于“公用事业的概念与范围”方面的研究文献加以批评性考察之基础上,尝试性地从语义学和类型学角度对该问题做出新的理论阐释。

一、公用事业:研究文献的批评性考察

国内外理论界和我国实践界对公用事业概

念与范围的理解并不统一。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ies)一般指的是“大多数为电力、天然气和通信行业厂商构成的一组厂商,受到一个或多个政府机构的严密管制。这些机构控制着企业的进入、制定价格、确定产品质量,也影响着厂商可以赚到的总利润。”^[1]作者将公用事业主要局限于电力、天然气和通信行业。

(2)公用事业是指城市中既为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各种经营性服务业,包括城市供水、供气、电力、公共交通、集中供热等许多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共事业民营问题研究”(批准号为07CZZ014)阶段性成果之一

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

孙建社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和谐世界”等国际战略思想。三者思想虽表述不同,但具有本质的共性和逻辑上的有机关系。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和谐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潮流的统一。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关键。

关键词 和平与发展 国际关系民主化 和谐世界 国际战略

孙建社,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97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高瞻远瞩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进而制定了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宗旨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0年江泽民针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局势,倡导世界各国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三者思想表述虽不同,但是具有本质的共性和逻辑上的联系,共同构成应对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和体现中国和平发展的中国国际战略指导思想。

一、与时俱进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各种力量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和组合,世界开始进入各国相

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关系日益密切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冷静观察国际局势变化,并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世界主要矛盾作出深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对全球性和重大战略性问题形成了清晰认识。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提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众多问题中的两大突出问题^①。之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世界的主要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先后将和平与发展确认为当今世界主题和当今时代主题。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纠正了我们过去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片面认识以及实践中带来的失误和负面效应,使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求

西方民主的观念基础

胡传胜

内容提要 20世纪,虽然西方的民主形式在全世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关于什么才是民主的制度,仍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争论。把个人自由的保护作为政治设计的基础,强调在否证的公共文化中按照得票来衡量执政的合法性,这些才是西方民主的观念基础。

关键词 民主 西方 自由主义

胡传胜,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10013

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一组公民权的约定;一种全体人民都平等享有的参与权,以及一个由这种参与权(至少从原则上说)规定的,多多少少是选举出来的议会;一个全国性的、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的行政首脑;一个或多个声称代表一定的选民或全体人民利益的、竞争性或排它性地掌握政权的政党——所有这些东西,是现代政治的独特现象。这些东西,在18-20世纪,就像林立的厂房一样,在全世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历史倒退300年,说全体国民都有平等的选举官吏的权利,或者说全体国民有某一组由宪法规定的、可以称作政治权利的“权利”(liberties,权利,从语义学的角度,是法律规定且保障的、合法的权利)^[1],不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都是大逆不道的。举例而言,就像几千年的文明史或者政治史向我们展示的,人们几乎一直在为国家的治理提供某种建议,甚至对当朝的政策作出某种

批评——纵然是最不开明的政权,也会为它的优秀分子之温和的、也是批评性的政治建议敞开不止一扇大门;这是在所有的文明中都可以见到的现象。但是,如果有谁说这样一种批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说,我这样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须受到国家保护的;这种说法乃是典型的时代误置。因为这样的权利观,这样一种对政治的理解,在现代以前是不存在的。的确,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接近了这种理解。但是,他们同样没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假定。这个假定是什么呢?它远非韦伯所说的理性主义的无所不在性,而是自由主义或者说个人权利的基础性。

民主在20世纪末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可以说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在当今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前,当美国领导人要推翻伊拉克当时的政权而代之以“民选的”政府时,那时的伊拉克领导人就按照“西方的方式”举行全民投票,检查自己的“民意基础”。结

外交的前瞻性:被动与主动的分水岭

——从中美两国外交发展历程的比较谈起

张 煜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美两国外交发展的历程比较谈起,提出前瞻性概念,揭示中国外交从“幼稚”逐渐“成熟”,由“被动”走向“主动”过程中存在的前瞻性问题,并且进一步发掘其根源,从而为我国“前瞻性”外交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前瞻性 中国外交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

张 煜,北京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100037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外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建设,促进了世界和平。然而,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外交,我国外交的前瞻性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较为清晰的阐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还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之中。其实,外交的前瞻性是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路线和政策时的一种预测性能力,是一种善于积极把握未来国际形势和营造有利于本国外交环境的主动性能力,是一种能够制定出为本国不同时期政府所遵循的外交方针的延续性能力。因此,外交的前瞻性主要由三个因素所构成:预测性、主动性、延续性。

本文将从中美两国外交发展的历程比较谈起,揭示中国外交从“幼稚”逐渐“成熟”,由“被动”走向“主动”过程中存在的前瞻性问题,并且进一步发掘其根源,从而为我国“前瞻性”外交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外交的成长之路:从“一边倒”走向“多极化”

提及中国当代外交史,一般是以建国后外交政策的演变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5年、1965年至1979年和1979年以后。如果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做一个极其简单而又高度概括的表征,那么就是“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多极化”。很显然,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由“幼稚”和“被动”走向“成熟”和“主动”的发展过程,而前瞻性问题则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

在第一阶段(1949年至1965年),即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外交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与外界的正常交流,争取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交,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由于国际环境所迫,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主要采取了“一边倒”,在国际事务中,以和苏联站在一起为主,采取了“联苏抗美”的政策。这时的外交工作主要是忙于应付眼

论市民意识与和谐社会建设

杨素云

内容提要 和谐社会是社会秩序形式上的和谐、稳定、持续发展与多元价值协调整合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体的外在行为方式与主体内心确信和心理认同的高度统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有序发展的高度统一。市民意识是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理性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机统一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培育现代市民意识。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市民意识

杨素云,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210096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和矛盾突显期,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和利益配置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形成全社会对改革开放和新的利益配置方式内在心理认同,形成广泛的心理共识,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和谐文化和精神价值体系。为此,必须进一步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法治相适应的社会主体的现代精神品性,推进当代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培育现代市民意识。

一、和谐社会的概念分析

“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1],和谐社会意味着一定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

上,以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为整体目标,以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人际利益关系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自由为价值依归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协调稳定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下列规定性内容:

第一,和谐社会是社会秩序形式上的和谐、稳定、持续发展与多元价值协调整合的有机统一。和谐社会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状态,这种秩序具有形式和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形式方面,和谐社会意味着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有序化状态的实现,意味着社会关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社会固定形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意味着“在自然界和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2]它表征为在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发展进程的连续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04SJD820002。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李里峰

内容提要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关键词 土地改革 基层政治精英 博弈 离心倾向

李里峰,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210093

近年来,中国乡村研究成为中外学界的关注热点。关于中国革命进程中基层政治精英的角色特征,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有人认为基层干部与传统士绅一样,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1];有人主张地方基层干部已经完全为党和国家所同化,是其在乡村的代理人^[2];有人采取较为折中的看法,提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代理人,又是地方社区利益的代表^[3];还有人强调应该注意地方精英人物自身的独立性和利益诉求^[4];因而,他们不是连接而是离间了国家与乡村社会^[5]。这些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因为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地位和多重身份,决定了其行为选择的不同方面。他们作为政治人,必须服从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意志;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成员和社区利

益的维护者;作为经济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基层政治精英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

本文将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在“运动型乡村治理”格局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6]。笔者认为,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群众运动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治理的基本手段,此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虽已达到了前所未见的强度,但基层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试图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呈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但与此同时,在已成乡村政治运作之常态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和乡村民众的广泛动员,基层政治精英又时常处于权责分

1934—1935 年白银问题大讨论与法币改革

吴敏超

内容提要 1934 年秋美国《购银法》实施后,世界银价剧烈上涨。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大国,很快出现了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等金融恐慌景象,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与思索。国内的经济学者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就美国提高银价的原因和后果、白银外流的防止办法、中国货币改革的方案等问题,先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鸣,为 1935 年底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关键词 白银 讨论 法币改革

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 100006

1934 年下半年开始,世界银价大幅度持续上涨,中国白银大批外流,金融中心上海处于极度恐慌之下,引起经济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据当时参与讨论的著名货币学家赵兰坪回忆,从 1934 年秋季美国提高银价开始,至 1935 年 11 月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改革止,“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1]可见,白银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币改革本身的成败得失,白银问题虽被认为是法币改革的一大原因,但事实上,白银问题和法币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理推衍还不甚清晰。本文的主旨,正是根据白银问题的演变过程和经济界讨论重点的逐步转移,把握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想脉络,探询法币改革的源流所在。

一、美国提高银价问题

1934 年 6 月 19 日,罗斯福签署《购银法》,同

年 8 月 9 日宣布白银国有,造成世界银价的剧烈上涨。纽约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司 49.31 美分,涨至 1935 年 5 月的 74.42 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 65 美分以上。伦敦银价也节节攀升,到 1935 年 4 月达到 1931 年银价的两倍以上^[2]。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大国,中国很快出现了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众多企业和商家破产的恐慌景象。国内的经济学者和金融从业者纷纷对此发表意见并寻求对策。

首先,人们分析了美国提高银价的动机。其动机可概括成以下几点:第一、政治上,民主党和白银派议员关系很深,民主党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白银派议员的欲望。第二,世界银价高涨后,用银国——如中国的制造品价格就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和美国竞争,以此造成美国对外贸易上的优势。第三,美国购买白银,可增加国内的通货准备,以便进一步贬低币值,实行通货膨胀。第四,企图恢复世界复本位,控制

“摩登”与“爱国”

——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述论

王 强

内容提要 1934年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社会各界力图通过社会舆论重塑“摩登”的含义,以及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政治化,并企图借此影响都市妇女时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妇女国货年运动反映了作为国货主要消费群体的都市妇女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它的失败暴露了近代国货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国货运动 妇女国货年 消费文化 摩登

王 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433

1934年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这一年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成为运动的主角,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国货厂商和社会舆论通过重塑“摩登”的含义,力图扭转30年代都市妇女流行的崇尚洋货的消费文化,并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道德化和政治化,以达到提倡国货的目的。妇女国货年运动反映了作为国货主要消费群体的都市妇女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它的失败暴露了近代国货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①。

一、妇女国货年运动的发起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竞相实行货币贬值,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造成国内货币紧缩,物价下跌,市场萧条。列强为转嫁危机,还争先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沉重打击了国内民族工业的

成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市场沦于日本之手,部分国货产品丧失了东北市场,加上同年南方数省的大水灾,使社会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地,国货销路日益狭窄。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坚的国货界发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货运动。

为进一步开展国货宣传活动,在上海地方协会等团体的倡议下,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此年中,各国货团体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国货展销活动,力图将国货推向全国。但是在1933年国货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份海关贸易报告击碎了国货倡导者们对国货年的期望,报告指出,1933年1月到10月,仅上海一地就消耗了外国的化妆品、香水、脂粉,139万余元^②。面对大量外货倾销,尤其是都市妇女的化妆品等奢侈品的大量进口,有人提出洋货入超的事实,“老实不客气,一般太太小姐们,是不得谗卸了”,“故在今日时代,与其劝

湖南早期女学堂创办的历史语境及曲折历程

万琼华 陈先初

内容提要 湖南女学堂在湘军获胜、维新运动、近代教育家群体和近代化变迁的多重历史语境下创办,经历了发端、顿挫和再起的曲折历程,这一曲折历程折射出新派与旧派、清廷与地方的力量制衡。

关键词 女学堂 历史语境 曲折历程

万琼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410082

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210082

受甲午战败刺激,兴女学被改革派视为国家现代化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预兆性符号。梁启超明确提出,女学的兴衰是衡量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1]民间知识分子受外国传教士在本土兴办女学,以及日本因教育而强盛的启发,竭力提倡女学,并身体力行。沪、津、宁三地首开女学风气,为内陆各省创办女学堂提供了最初的模式或范本。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在湖南这块充满新学意识和新文化生机的地盘上大显身手,各显千秋。一时间,湖南被誉为全国最富新文化新教育之朝气的省份,男女平权和女学新思想随之广为流布。女学堂的创办既是近代湖南文化生活方式、普遍伦理观念转变的一面镜子,某种程度上又充当了新旧派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一个场域,其兴衰存亡折

射出新旧两派此消彼长的态势。

一、湖南女学堂初创时的历史语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湖南的地方发展获益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湘军击败太平军;二是戊戌变法之前的新政运动,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是这两个契机使湖南的地方近代化如虎添翼,后来居上,成为一度引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思想、文化和政治进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新式教育改革和新式教育家群体的形成,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为湖南女学堂初创准备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一) 湘军获胜带来的资金为女学堂的创办提供了物质基础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全国几为湘人势力笼罩”,曾国藩为安抚湘军将士及家属子弟,在县城广建忠义祠,为阵亡将士发放抚恤金,使

论近代清江浦城市衰落的原因

金 兵 王卫平

内容提要 清江浦曾是运河沿岸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到近代却逐渐走向衰落。尽管清江浦在许多城市史著作中被当作近代衰落城市的典型,但是至今却少有详细的个案研究。近代清江浦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漕运的没落、河工的废弛、灾害的侵袭、战乱的破坏、城乡经济结构的单一都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而近代交通线路、交通方式的变更,对于作为交通枢纽的清江浦的打击应该更为关键。

关键词 清江浦 城市史 衰落

金 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215123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15123

清江浦是今天淮安市(2000年以前叫淮阴)主城区历史上的名称^[1],曾是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繁荣一时的交通枢纽城市。12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以后,这里成为黄、淮、运三河的交汇之处。明永乐年间,陈瑄总督漕运,开凿清江浦河,使运河由此入淮,并修建船闸,清江浦城市因而兴起。当时由于北方运河水量不足,政府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船通过,因此大量旅客必须在此进行“南船北马”交通方式的变更。由于地处三河的交汇之处,又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交通中转站,清江浦一度曾有“七省咽喉”、“九省通衢”之称。明清时期这里设有许多重要机构,驻扎着各类大小官员。明代设有属于户部管理的皇家仓

库、隶属于工部的四大漕船厂等;清代南河总督、漕运总督曾先后驻节于此^[2],驻清江浦总督以下的各级衙门曾一度达到近30个。清江浦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异常繁盛。然而,19世纪后半期,随着运河的淤塞、漕运的衰废和海运的兴起,清江浦赖以发展的交通优势逐渐丧失;进入20世纪后,随着津浦铁路的开通且绕道安徽,清江浦的城市地位更是急剧下降,城市走向了衰落。

近代清江浦的衰落首先表现为城市人口的锐减。乾隆四十年(1775)清江浦人口高峰时曾达54万人^[3],到宣统三年(1911)清江浦人口已不及10万人^[4],1949年解放时,清江浦的人口仅剩3.6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冯贤亮

内容提要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关键词 江南 吴中 县衙 地方社会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0433

一、引言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在这方面,直接针对衙门而引发的纯学术研究,尚属寥寥。而有关州县行政的考察,却为数可观,学者们的关注程度较高。其学术前提,是政治史与制度史的长期重视。在后来的学术变化中,法制史的再度兴起,导致了人们对于州县行政律法及其实践的兴趣,出现了像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这样的经典之作^[1]。当时与后来的相关研究,其实都未超过瞿氏。瞿氏虽以行政律法的实践为中心,却基本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常规制度及运作模式;考察

内容涉及州县官、书吏、衙役、长随、幕友这些州县行政的主角,具体实践包括司法、征税、其它行政事务以及士绅与地方行政的诸多关联,资料极为丰赡,论析相当精审。后来的类似研究,大都受到瞿氏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瞿氏的论述系统与资料线索上作了若干扩展,实际并无大的突破。

关于明代的研究,杨联陞的工作较早,对明代府、州、县政府的权力运作及其特点等都有宏阔的探讨^[2];在大陆,柏桦较早直接以明代的州县政治体制与官僚群体研究为题^[3],同样是关于明代帝国广泛性的考察,何朝晖的明代县政研究也显得较为细致深入,都适当考察了明代州县衙门的设置与功用等问题^[4]。

再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5]、缪全吉的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2006BLS002)的阶段性成果

理性看待法律真实

李玉华

内容提要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真实就是形式真实。法律真实说是在反思传统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提出的,法律真实在推动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和转变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片面强调法律真实也会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消极影响,应当实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法律真实 形式真实 客观真实

李玉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100872

近些年,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的观点颇为流行,司法实务部门也不乏积极响应者^[1]。然而法律真实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在司法实践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此学界却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对于法律真实在当代司法中的作用也鲜有客观公允的评价。司法实际部门对于法律真实这个“新”名词,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法律真实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理性分析。

一、法律真实的涵义

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法律真实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结果的真实性状态的一种描述,就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了当时法律所规定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法律产生以来,每一个时期均存在法律真实,只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和法律制

度等的不同,法律真实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在神示证据制度下,神示的真实即为法律真实;在封建的法定证据制度下,满足封建法定证据的真实即为法律真实;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心证制度下,裁判者内心确信的真实即为法律真实;在我国传统的证据制度下,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真实,才是法律真实^[2]。

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真实是相对于客观真实(实质真实)而提出来的,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认定的结果不一定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真实就是形式真实。美国学者罗伯特·莎摩尔(Robert S. Summers)在《在司法事实认定中的形式法律真实与实体真实:存在于某些特定案件中的正当分歧》一文中,就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形式法律真实”、“形式真实”、“法律真实”。他把由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团)所认定的事实称为“形式法

本文为李玉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诉讼证明标准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5CFX019。

“楚河汉界”与“貌离神合”

——对公法与私法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

赵娟

内容提要 公法与私法之区分的实质意义在于划出公私两个领域之间的“楚河汉界”，公法与私法在价值追求上的同质性又使得二者“貌离神合”。在我国，既有明确公、私法之“楚河汉界”的必要性，也具有实现公、私法之“貌离神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 公法 私法

赵娟，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10093

公法与私法研究是法学领域的经典论题。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公私法划分的标准认识不一、观点各异，尽管如此，宪法与行政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的基本划分仍然得到了普遍承认，这种基本共识在理论上构成了公法与私法“对话”的平台。本文即在认同此共识的基础上，试就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楚河汉界”：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实质意义

在论及公法与私法问题时，民法学者张俊浩教授指出：“罗马法视私人平等和自治为终极关怀，对于权力猖獗怀报高度的警戒之心，以至于试图用公法私法的‘楚河汉界’去阻隔。天真之余，极其严肃。”^[1]笔者十分赞同。如果说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一种“人为”的安排，那么，这种安排的实质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形式意义。

1. 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前提是承认公与私之间存在界限

从总体上看，公、私法以其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而不同：作为调整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私法处理私人身份的公民(或称私主体)之间的冲突；公法是调整作为公主体的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作为私主体的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2]。如果我们把私法规范看作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由来已久”的准则——作为群居的人类面对不可克服之自身矛盾的一种选择，那么，公法规范则因政府这种“必要的恶”的存在而存在。

政府这种公共机构的存在决定了公法的存在。自由主义宪政理念认为，政府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人民通过达成契约的方式设立政府，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规定并实施人

本文最初为南京大学法学院2006年12月举办的“公法与私法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所作，后进行了修改。解亘副教授就相关民法问题提供了帮助，胡敏洁博士对论文题目提出了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论诉权的人性基础及其宪法化

汪汉斌

内容提要 诉权论被认为是诉讼的出发点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长期以来囿于民事诉讼法学的狭小领域,诉权研究者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各种诉权学说相继问世,认识上却莫衷一是、难成共识。“宪法诉权说”颇有新意,但至今仍停留在“理论假说”或“理论预设”状态,缺乏科学、缜密与充分的理论论证与说明。本文从诉权的人性基础、诉权内涵的时代变迁以及诉权的法律归属等方面诠释与论证“宪法诉权说”,试图跳出民事诉讼法学的樊篱,寻找诉权理论的高级法背景,以提升诉权的法律品位,打破诉权研究的胶着状态。

关键词 诉权 人性基础 时代变迁 宪法化

汪汉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10097

将纠纷与诉讼链接起来的是当事人诉权的行使。诉权论被认为是诉讼的出发点^[1]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2],并因其复杂性而被誉为民事诉讼理论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有关诉权的学说可谓众说纷纭,学派林立。从罗马法将诉权(actio)与实体请求权统合于诉的制度当中,到十九世纪前半期随着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分野,萨维尼提出私权诉权说;再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公权观念的兴起和公法理论的发达,各种公法诉权说的相继出现(包括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等),一直到前苏联顾尔维奇、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的“二元诉权说”^[3],诉权理论研究长兴不衰的同时却也歧见迭出,一时难以达

成共识。所以造成如此局面,笔者以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的诉权研究者一直囿于民事诉讼法学的狭小领域来考察、分析、诠释诉权,先验地将“诉权”预设成民法学所独有的“范畴”,无视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中同样有诉权存在这一事实,忽略了诉权背后可能存在的高级法背景。研究视域的狭隘,研究资源的局限,难免造成结论的捉襟见肘。因此,跳出民事诉讼法学的樊篱,寻找诉权理论的高级法背景,以打破诉权研究的胶着状态,理应成为诉讼法学者的理论自觉行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日本学者在德国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的基础之上,提出应将宪法上所保障的诉讼受益权性质引进诉权理论,明确提出“宪法诉权论”。但响应者寥寥。随着1970年

1949 - 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

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项目批准号:01BZW037),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专著《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

该成果是主持人前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的后续研究课题,与前课题成果共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新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并提出具有中国当代文化特点的理论建构。这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具有建设性意义。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

1、俄苏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在俄苏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和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并且围绕着真实与真实性、本质与典型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人民性和党性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论争和探讨,这其中揭露社会矛盾和表现人道主义是共同的文学主题。

2、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八十年代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仅发现了“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的人,而且不断地向人的精神领域开掘,探讨人类的终极命运。中国文学从形式层面的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开始,通过审美功能的强化进一步促成文学本体层面的嬗变。

3、萨特存在主义及其相关文学思潮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萨特“人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启了人的“存在”探询的新领域,深化了“人”的观念的发现与重构。

4、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根本在于中国本土具有相对应的传统文化因素和市场话语的合力作用。后现代主义引起了 90 年代小说人的观念嬗变,对 90 年代文学的文体特征和美学追

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运用比较叙事学的方法,分析西方现代叙事学和中国叙事传统的冲突与融合,通过解剖以马原、余华、莫言、格非等为代表的当代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和美学属性,探讨中国文学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对策和出路。

6、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话语是女性主义理论与西方其他理论方法的结合。鲜明的目的性使其在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方式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变化。

7、从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两个方面,朦胧诗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吸收和选择,开始对人的价值和生存处境进行反思。西方戏剧对人性的荒诞表现,促使中国当代戏剧感受更多的是人性复杂的一面,却没有真正实现“用荒诞的形式表现荒诞的内涵”。

8、儒家文化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积极入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士的精神,影响了 80 年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并在 90 年代作家中呈现出多元的转化趋势。

该成果主要特色是:第一次坚持以人的发现及其观念的演变为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注重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对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探讨文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时坚持一个宏阔而贴切的文化视野,重点关注当代中国作家在面对外来文学影响时的主体自我独创与对民族文学的新建构。作者注重对文学本体的研究,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而将较重要的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于其中,克服当下“文化研究”替代“文学批评”的弊端。全书史料丰富,以富有说服力的史实,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定论和成见,为深化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野、思维模式和价值坐标。

经济哲学方法论导论：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方法

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哲学方法论导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方法”（项目批准号：01CZX010），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

成果的主要内容是：

1. 揭示亚当·斯密经济哲学方法的局限性。斯密的古典历史主义经济哲学方法想要完成的，实际上是在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背景中实现经验性理论话语与历史性话语的结合。它存在着两点局限：一是它事实上无法实现对现实经济领域的本质认识；二是它无法真正理解历史性话语中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

2. 揭示李嘉图思想的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所论述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所反映的已经不再是斯密的那种自主、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客观性的、具体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李嘉图对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3. 揭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哲学方法尽管是“历史的”和“唯物的”，但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李斯特的思路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他事实上是用历史的概念掩盖了客观事物的历史性发展；第二，由于他不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不能像马克思一样获得“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观点，因而即使是在对过去的历史的分析方面，他也无法找到科学的入口处。

4. 揭示了萨伊的庸俗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及拜物教性，以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性和抽象性。萨伊将经济学从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仅仅停留于流通的现象层面，并将之视为经济学的本质，从经济哲学方法论上讲，这完全是一种经

验主义和拜物教的思路。

5. 阐明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第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是一种经验历史主义与抽象的人本主义并存的复调逻辑；第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在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上还更多地停留在一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因而在经济哲学方法上还是一种经验历史主义；第三，指出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已经超越了亚当·斯密，达到了大卫·李嘉图的水平，开始立足于“负载着特定的历史关系”的视角来理解生产关系；第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最终完成；第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双重视角，揭示了马克思《资本论》独特的哲学意蕴，得出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的深刻结论。

6. 揭示了邓小平经济哲学方法的深层内涵。邓小平之所以能更为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的内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所阐述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内在统一性，强调离开马克思的哲学便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反之，离开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第二，打通了从斯密到马克思、邓小平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为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经济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第三，强调了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作论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研究历史唯物论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李葆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02BYY030),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对象语言和工具语言的原创》。

20世纪下半叶迅速兴起的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预示着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克隆人成为21世纪的两大人类梦想。虽然计算机的研制初衷缘于数值计算,但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者A.M.Turing在《机器能思维吗》(1950)中,已经预见到计算机将与自然语言结下不解之缘,并且提出语言信息处理能力是检验计算机智能的最好标准。20世纪90年代,日本宣布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机研制工程失败。智能机的研制关键是自然语言处理装置,而正是语义处理问题成为智能机工程的“瓶颈”。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端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该项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国际前沿性的工程语言学课题。

项目研究目的是基于元语言的四层级理论和技术路线,逐步建构现代汉语词汇元语言、释义元语言和析义元语言系统。同时进行汉-英释义基元词的比较,为建构认知元语言系统打下初步基础。

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创造性工程,除语言学领域自身,还涉及哲学、逻辑学、文化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以及百科知识。这一语言工程的完成,可能推动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词典学和语言信息工程等领域出现一系列重大突破。

成果主要内容是:“引论”部分阐述了自然语言处理装置的研制思路。第一章阐述元语言研究的两大分野、元语言研究的理论建构以及技术路线。第二到第四章是词汇元语言工程,研

制书面《日常会话基本词表》、《通用受限词表》和《三岁前儿童基本词元集》。第五到第八章是释义元语言工程研究,包括《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用词计量研究与《释义元语言基元词表》的研制,以及汉-英释义元语言基元词、汉-泰释义元语言基元词比较。第九到第十九章是析义元语言工程,对常用名词、称谓词、形象类别词、肢体动作词、范围和程度副词等进行义征挖掘。第二十章是语义网络建构工程。附录包括波兰语义学派评介、莫斯科语义学派评介和《现代汉语元语言释义微型词典》。成果还提供了软件“汉语元语言释义微型词典检索系统”和“汉语释义元语言词典编撰工具”。

成果主要观点是:1.提出“语言科技新思维”,为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结合确立了新的基点。基于对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思,提出语言研究的实验主义理念。2.论证了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是语义性,建构了语义语法学理论。语义语法学理论与元语言理论的结合,为语义网络建构提供了可操作途径。3.基于“逻辑学元语言”和“语言学元语言”的分野,建构了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元语言是一个包括词汇元语言系统、释义元语言系统、析义元语言系统和认知元语言系统的多层级体系,可以采取逐步抽象法逐层建构。4.提出“语言人工脑”即自然语言装置研究的新思路。5.基于言语的分层性、语域性、语体性,论证了语言研究的受限理论;基于“个体语言成长论”,提出了语言系统描述和语言能力模拟的仿生思路,建立了语义研究的内核模型。6.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提供了第一份《释义元语言基元词表》,完成了第一部《现代汉语元语言释义微型词典》,并研制出第一个“释义元语言词典编撰工具”。7.提出了词汇语义分析的人本主义语言观。人是认知世界和社会活动的主体,

语言符号系统是人认知对象世界的主观化建构,语义分析应以人的日常感知为基准。8.重新界定了义征的性质,提出了交错性义场建构理论,建立了义征提取步骤、层级标注和评估方法的操作性程序。对大批量词语进行了语义特征分析,为建构《现代汉语语义特征集》和词汇语义系统

提供了基础。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建构了多层次元语言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现代汉语元语言研究,通过大量实践解决了语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成果的应用价值在于面向辞书编撰、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工程等。

基于知识库的中文信息自动标引及自动分类

南京农业大学侯汉清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知识库的网页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研究”(批准号为02BTQ012),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

研究成果采用的是基于标引经验或标引实例的自动分类模式,依据情报语言学中分类语言、主题语言、自然语言三者之间兼容互换的原理,采用统计方法对这些人工标引记录进行挖掘,建立分类号—关键词(词串)对应库,即分类知识库,再将标引词(串)与分类知识库中的词串进行相似度计算,给出与相似度最大的词串对应的类号,完成赋号标引。

成果主要内容是:

1、构建用于自动分类的知识库。以在国内影响最大、用户最大的知识组织系统——《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主干,从国内众多的中文文献数据库中存在的海量的人工标引记录中挖掘出分类号、主题词(串)、关键词(串)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构建出一个可以用于中文信息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的知识库。其中包含:抽词词典、停用词典、同义词表、义类词典、分类号——关键词(串)对应表、地名表、时代表、文献类型表。

2、在知识库的基础上,完成中文信息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系统。系统主要包括:网页处理模块、信息提取和自动标引模块、标引结果处理模块、知识库生成维护模块。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①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知识体系为核心的知识库研制技术;②确定网页文本信息的标引源及

其加权方法;③利用词频加权统计标引法对网页进行主题标引,并增加对网页新词的标引能力;④采用“词面相似度”算法完成主题词串的多级分类。

成果的主要特点是:

1、基于词表、基于专家库,知识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包含了大量的新词、以及组合类目;

2、采用词串定类、概念定类,而不是采用单词定类、字面匹配,使得分类的结果更加准确;

3、分类采用匹配算法,同时考虑词串的字面匹配和语义匹配,从而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提高系统运行的速度;

4、能够实现多层分类,最多分类可达到《中图法》的六、七级类目,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给出多个类目,并考虑信息检索的需求,加入了单独的地名标引;

5、既给出关键词,同时也给出了规范后的主题词,提供主题和分类的多途径检索。

目前,完成的知识库和系统已经在网页、期刊论文、图书中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自动标引和分类中得到实际应用。

(本栏目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供稿)

[责任编辑:平 啸]